

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

3

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 近现代转换

方克立 主编



商務印書館

第12届中国哲学年会论文集

3

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 近现代转换

陈其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 近现代转换

——第 12 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
论文集之三

方克立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换/方克立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之三)
ISBN 7-100-03556-2

I. 中... II. 方... III. 哲学-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431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换
——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之三
方克立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3556-2/B·538

2003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1/4

定价: 37.00元

序

1999年7月,在台湾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上,我接受了两年后在北京主办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的任务。国际中国哲学会自1975年在夏威夷注册成立以来,它的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中国哲学会议,通过这一活动联络和团结世界各国各地区热爱中国哲学、热心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为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使其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共同奋斗。前七届会议都是在美欧国家召开的,1993年的第八届会议首次回到中国哲学的故乡,会址选定在北京。我作为那次大会组委会的副主任曾参与一些具体工作,深感这一事业前途无限。以后三次会议分别在波士顿、汉城和台北一嘉义召开,东西方学者之间加强了交流与合作,中国哲学研究队伍也不断有新人参加。各国学者普遍认为,新世纪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矛盾,其前景不应是如某些西方学者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及其所造成的灾难,倒是主张“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所指出的多种文明的共存之道更符合全人类的愿望,也更具有现实性。在新世纪,中国哲学智慧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中西两种哲学传统的平等交流、对话、互补与融合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新阶段。因此,将于新世纪头一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就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大家希望这次会议能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召开。多

年来一直热心推动这一事业的成中英教授说：“从第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到第十二届大会，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回归，象征着中国哲学回归本原。面向新世纪，这次大会又是一个新的起点，站在这块伟大的土地上，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步伐将迈得更加坚实而有力。”他的话代表了各国中国哲学研究学者的共同心声。

经过一年多紧张的筹备工作，2001年7月21—24日，由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北京顺利召开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典、斯洛文尼亚、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300多位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共提交学术论文250余篇。除了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之外，召开了4次全体大会，52场次分组会议，204位学者在大会或分组会上报告了论文。各国学者围绕着本届大会主题“中国哲学与21世纪文明走向”，就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普遍价值、儒/道/佛/墨/易学哲学的原创性贡献及其现代意义、经典与诠释、世界伦理与生态伦理、中外哲学比较与会通、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反思、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文明对话与文明冲突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会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正如刘文英教授在大会总结发言中所指出的：“这次大会的规模之大，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哲学在世界上受到如此广泛而隆重的关注，它表明古老的中国哲学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将对中国现代文明和世界现代文明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01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国政府经过15年艰苦努力，终于在这一年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今后

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在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召开前一周(7月13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取得了成功,表明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已经得到并将进一步加强:在世界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明显减速的情况下,2001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快增长、高效益、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4%。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不仅大大振奋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也使古老的中华文化重新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和研究兴趣。历史实践证明,人类在“轴心时代”涌现出来的几大文明在今天都有着不衰的生命力,今后的世界仍将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也将再次迎来它的春天,21世纪很可能就是伟大的中华文明复兴的世纪。作为中华文化之核心的哲学智慧在这个时候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是毫不奇怪的。

然而,正当人们对新世纪充满美好希望和憧憬之时,2001年却发生了不幸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接着美国飞机连续两个月在阿富汗的土地上狂轰滥炸,在摧垮塔利班政权的同时,也炸死炸伤了数千无辜平民。文明冲突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全世界人民怵目惊心,永难忘记。人们更为以暴制暴、冤冤相报有可能使这个世界永无宁日而深感忧虑。当今人类面临的另一严重问题,就是地球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直接威胁到我们以及后代的生存与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共同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协议、公约与宣言,要求全人类共同遵守,特别是要求那些消耗自然资源最多、造成环境恶化责任最大的发达国家首先遵守。但是,

2001年3月,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美国却单方面宣布退出防止地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使这一国际公约不能生效因而也得不到全面贯彻实行。以上提到的都是在新世纪、新千年的头一年,也就是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召开的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面对着困扰当今人类的这两大难题——生态破坏与文明冲突,人们在思考、探讨对应之策时惊喜地发现,古老的中国哲学早已为此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智慧成果,或者说其中早已蕴含着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正确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的智慧。并不是说我们的先哲早就预见到了今天的人类会面临如此严峻的生态危机和文明冲突问题,而是在他们的时代也必须面对这些矛盾、冲突的萌芽或原始形态,也必须思考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因此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和主张,不过在中国哲学中主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天人合一”论、主张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和而不同”论始终占主导地位而已。中国传统哲学对“天人合一”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诠释,其中不乏神秘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说教,但其中心价值确实是阐明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民胞物与”、“万物并育而不害”的宇宙观。中国的先哲早就认识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因此,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就不只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原则,而且还必须落实到善待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行为中去,这从我国上古时期就设有“虞师”之类的生态环境保护官员,战国时期就有了《田律》之类的自然资源保护法,以及《礼记·月令》中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的制度性

规定都可以看得出来。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这种古老的生态智慧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对现代人仍极富启发意义。中国哲学中的这些关系到人类命运与文明走向的重要的思想资源,自然是本次大会各国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会有许多精彩的阐释和发挥。

为了把本次大会的主要学术成果保留下来,大会组委会决定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论文集共四册,其中英文一册,中文三册。英文一册即以大会主题《中国哲学与21世纪文明走向》为书名,由张丰乾博士负责选编。中文论文按其内容分别编入《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换》、《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三册中,吴卫国博士、谢荷生博士、高全喜博士分别负责三册的选编工作。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次大会收到的论文中还有近百篇未能入编论文集,我们除了向作者表示歉意之外,也要对他们的积极参与和为会议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承担了论文集的出版工作,我们深感荣幸,也不胜感谢。最后我还要提一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卓越知识分子,成功的科学家、事业家,中国文化的守护人,也是本次大会的与会代表,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本论文集的出版作出了无私奉献,在这里,我要以大会主席的名义对他深表敬意。

方克立

2002年7月20日

目 录

1. “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的双向互动	汤一介	1
2. 有关“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的再反思	刘述先	20
3. 21 世纪人类文明的多元趋同与世界伦理建构 ...	赵吉惠	31
4. 哲学与中西文化:反省与创新	郭文夫	48
5. 中西会通的四大层面	耿成鹏	59
6. 百年来中西文化论衡		
——从文化哲学看中西文化相处的问题	李锦招	64
7. 中国哲学的形上观照	陈庆坤	79
8. 境界的形而上学与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塑	宁新昌	101
9. 传统经学的本体论问题		
——对《易传·系辞》中有关概念的分析研究 ...	刘 正	114
10. 《易经》中的“通变”思想		
——兼论中西方哲学思维的差异与相互理解	田辰山	124
11. 《周易》象数与毕达哥拉斯之数		
——中西哲理的潜在构架	张祥龙	144
12. 春秋时代的德行伦理与早期儒家伦理学的特点		
——兼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异同	陈 来	180
13. 论中国存有学与虚静式融通	黄筱慧	203

2 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换

14. 道家哲学与马斯洛	吕锡琛	215
15. 唯识新探:詹姆斯对熊十力	李绍崑	232
16. 伽达默尔的“真理”观与中国哲学方法	袁尚华	241
17. 自由与权威	袁信爱	257
18. 东西方哲学的汇合与东方哲学的转型	黄心川	274
19. 东西文明观和中日两国现代化	钱国红	286
20. 论东亚的儒释道和合	李甦平	299
21. 儒家思想与越南革新开放	何成轩	316
22. 论中国哲学的前近代启蒙	苏志宏	351
23. 何谓道德本体建构的正确思路? ——以中国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为例	李承贵	366
24. 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平议	吴小龙	384
25. 试论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转向问题 ——以张东荪先生为例	张耀南	409
26. 分析哲学在中国	胡 军	431
27. 从“人生佛教”看中国佛教的价值	李明友	443
28. 现实关怀与超越追求的再激荡 ——儒家文化命运的后顾与前瞻	丁为祥	451
29. 直觉与智慧 ——略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对直觉范畴的 探讨	高瑞泉	473
30. 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意义	徐国利	516
31.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	蒋国保	546
32. 牟宗三“别子为宗”说评析	陈代湘	561

33. 牟宗三的哲学诠释学概述	王兴国	581
34. 扬清激浊 返本开新		
——徐复观论儒家政治思想	刘鸿鹤	630
35. 新儒学价值论	林国雄	668
36. 李大钊的社会理想述评	吴根友	700
37. 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转换的途径		
——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例	王兴国	718
38.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次飞跃	张允熠	731
39. 关于新世纪邓小平理论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	李哲承	746
40. 道统与政统		
——兼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郑彝元	757
41. 马克思主义的佛教观和佛教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佛学概观	李广良	765
42. 道教在 20 世纪的变革与未来的发展	孔令宏	785
43. 《周易辨证》的易经诠释学	马恒君 温海明	800

“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 的双向互动

汤 一 介

在鲁迅《拿来主义》一文最后有这样一段：“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新主人，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①从鲁迅《拿来主义》的全文看，他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现在我们仍然要自己来拿，把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好的文化资源按照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统统拿进来，作为养料，建设我们的现代新文化。在鲁迅的这篇短文中也谈到了“送去”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送去”，常常是把一些“古董”和自然资源等等作为“礼物”送了出去，“发扬国光”，无非是向别国“磕头贺喜”罢了，这和真正的文化交流无关。

今天，我们还要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只有善于并勇于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化充分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不是以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拿进来，才可以促使我们自身文化得到更新。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作为“他者”来观照我们自己的文化，才

^① 《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1—33页。

2 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换

能更好地看见自身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关于应该引进与如何引进外来文化的问题,最近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不必多谈了,这里我打算多谈一点“送去主义”的问题。

我多次访问过欧美的许多大学,我感到很吃惊,为什么除了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生之外,学其他学科的大学生几乎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可是,如果看看中国的大学生,哪怕是学习理工医农的同学,他们对西方文化(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有些同学还可以说对西方文化的知识相当丰富。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无非是认为我们中国在各方面都落后,那些西方国家看不起我们(包括我们的文化),你们中国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我想,问题也许并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先谈一点历史现象,也许对这个问题会更进一步的了解。

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它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呢?查看慧皎《高僧传》就可以知道首先是由西域或印度僧人把佛教传入中国,然后才有中国的僧人或信士到“西天”去取经。可是中国文化(如儒家、道家思想等等)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相应地传到印度。据《旧唐书》、《新唐书》、《高僧传·玄奘传》等记载,《道德经》曾译成梵文,但据季羨林先生说:《道德经》“是否传至印度,则我们毫无根据来肯定或否定”。^①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道德经》的梵文本并没有对印度文化发生任何影响,并且早

^① 《佛教的倒流》,见《季羨林文集》第一卷,第412—422页。又见于《学海泛槎——季羨林自述》第254—255页。

已不存在了。在汉唐时期(甚至到以后各朝各代)为什么印度佛教经典大量译成汉文,^①而中国的经典和著述却没有被译成梵文(或印度的其他文字)而在印度流传,并对印度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呢?

从历史上看,自2世纪起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络绎不绝,几乎年年都有,而且许多僧人往往是一生都在中国度过。到三国以后,才有中国僧人或信士到西域或印度去学佛取经,例如最早的有朱士行,后来最知名的法显、玄奘、义净等等,但我们到西天学佛取经的人却大大少于西域和印度来华的和尚。而且中国人去印度目的很单一和明确,就是去取佛经,几乎都没有把中国文化传入印度的意图。这是什么原因?

到隋唐以后,我国的东邻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丽和日本都派遣“学问僧”或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佛教或者儒、道思想,甚至学习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音乐、舞蹈、建筑、饮食等等)。我们从当时朝鲜和日本僧人带回国的汉文书目可以看出,其中儒、释、道、文、史、笔记、小说种种都有,现在保存在朝鲜和日本的许多汉文典籍在中国却早已散失了。可是同一时期或稍后,我们并没有以同样的热情把朝鲜和日本文化也引进中国。这又是为什么?

但很奇怪,中国的有些技术却很快传到国外,并为他们所利用,例如所谓的“四大发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就是典型的例子。无疑西方技术的某些方面曾受惠于中国,而近两三百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中国又远远地被西方抛在后面了。

如果说,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基督教)在唐朝已传入中国,但

① 据唐《开元录》记载,自汉至西晋250年间翻译佛经共1420卷,而东晋这一时期(包括同期北方的后秦、西秦、前凉、北凉)则共译佛经1716卷,至唐《开元录》入藏则已达到五千年零四十余卷。

并没有起什么大作用。直到16世纪下半叶后,西方为了开拓市场来到中国,最初进到中国的是一批传教士,如罗明坚、利玛窦等,他们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传教,但也带入了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从此西方文化就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虽然后因“礼仪之争”,西方文化的输入有所中断,到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和入侵,西方文化以更大规模地进到了中国。然而,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却在那里的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推崇备至;^①伏尔泰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②等等。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都不是由中国人所传授的,而都是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中得到的。从19世纪末到如今,在中国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在许多方面都是从西方搬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创建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中国新文化。同时,自本世纪初起公私留学生大量流入西方,近年来犹如潮水一般向西方涌入。20世纪前半个世纪,西方列强还在我国办了许多教会学校,输入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价值观念。这一阶段,都是我们向西方学习,主动地或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而我们很少主动地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这又是什么原因?

从以上情况看,我们的国家无论在强盛时期(如汉唐),还是在衰弱时期(如清末以后),在与外国的文化交往中基本上都是“拿

① 莱布尼兹说:“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类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见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3期,1982年1、2期庞景仁译《莱布尼兹致闵明我的两封信》。利奇温说:启蒙运动中“第一个认识中国文化对西方发展之巨大精神作用的是莱布尼兹”。见于《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王昭仁、曹其宁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243页。

② 《伏尔泰书信集》中有一位年轻人理查德(Reichard)给伏尔泰的信中说:“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转引自孟华《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来”，但很少把我国的文化主动地“送去”。到现在为止，在西方除了少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点兴趣，在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作了点认真研究，而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外(其中还有不少学者是为了西方侵略或掠夺中国而来研究中国文化的)，绝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某些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合理发展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则盲无所知，他们知道的中国或者是舞龙灯、踩高跷、扭秧歌，或者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

大概在进入 21 世纪的第一周，我企图对上述现象的形成找出原因来，可怎么也难找到一种或几种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合理的说明。但是总不能就样放下等别的学者来解释吧！这里我就试着说说我对中国文化出现的这种现象的见解。我认为，在中国强盛时期，我们没有主动地向印度输出中国文化，也许是当时有些中国的士大夫认为外国人和中国人本性不同，外国人很难接受中国的“教化”，如何承天所说：“中国之人，禀气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戒这科。”^①可是同时期在中国又有《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为了争胜而泡制了老子出关去“教化”胡人(外国人)的故事，这岂不矛盾？特别是在当时(南北朝)和以后(隋唐)有更多的学者和中国僧人认为，印度佛教比中国文化更高明，张镜有“放华犹昏，文宣未旭”之语，^②宋文帝有“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政；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之论。^③是时，中国之名门士族之子弟或出家为僧，或在家信

① 何承天《答宗居士书——释均善难》，《弘明集》卷三。

② 张新安(张镜位至新安太守)《答谿王论孔释书》，《弘明集》卷十二。

③ 《高僧传·慧严传》中引宋文帝语详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与第十四两章。